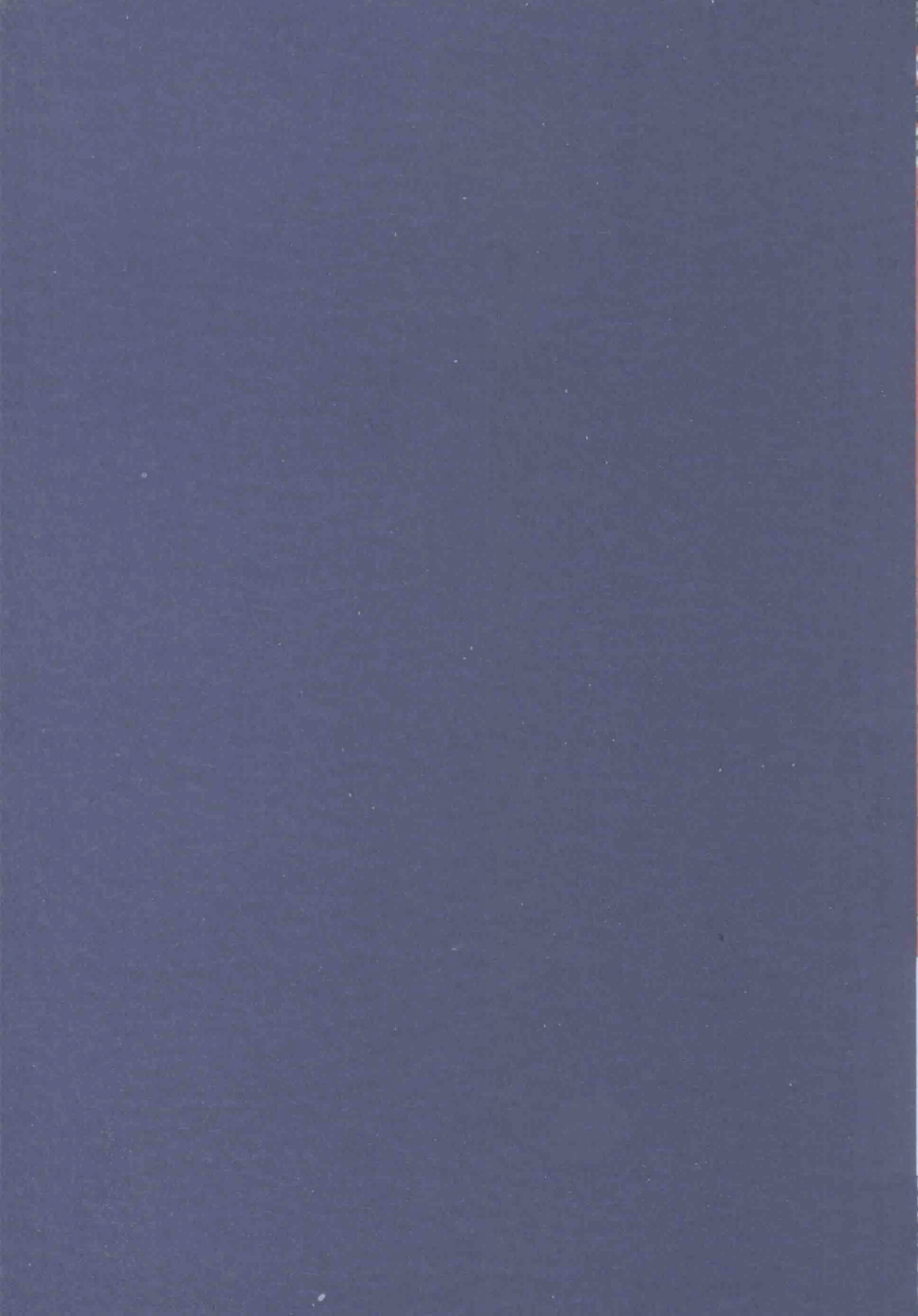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林徽因集

建筑·美术  
〔下〕

24263  
04  
V4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林徽因集·建筑 美术：全2册 / 林徽因著；梁从诫编．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4

ISBN 978-7-02-010481-9

I．①林… II．①林…②梁… III．①林徽因（1904～1955）—文集②建筑学—文集③美术—文集 IV．①Z4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 114561 号

责任编辑 王一珂  
装帧设计 刘 静  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88 千字  
开 本 720 毫米×1020 毫米 1/16  
印 张 41.75 插页 8  
版 次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481-9  
定 价 96.00 元（上、下卷）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：01065233595

梁思成在一九五四年一月油印本《中国建筑史》前言中说：“这部稿子是一部集体劳动的果实。……林徽因同志除了对辽、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，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。”这里明确说明《中国建筑史》初稿第六章的宋辽金文献部分原为林徽因执笔。《中国建筑史》成书后未能及时出版，随后一九五四年稍有修改，稿本第六章为“宋、辽、金”，油印本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《梁思成文集》及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九九八年单行本，将第六章改为“五代·宋·辽·金”。林徽因原撰写的“第一节 北宋之宫殿苑囿寺观都市”至“第四节 南宋之临安”在刊印本中均依次排为第二至第五节；刊印本“第一节 五代汴梁之建筑”不是林徽因执笔。

## 《中国建筑史》第六章 宋、辽、金部分

### 第二节 北宋之宫殿苑囿寺观都市

宋太祖受周禅，仍以开封为东京，累朝建设于此，故日增月异，极称繁华，洛阳为宋西京，退处屏藩，拱卫京畿，附带繁荣而已。真宗时，虽以太祖旧藩称应天府，建为南京（今河南商丘县），乃即卫城为宫，奉太祖、太宗圣像，终北宋之世，未曾建殿。其正门“犹是双门，未尝改作”<sup>〔1〕</sup>叶少蕴《石林燕语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仁宗以大名府为北京，则因契丹声言南下，权为军略措置，建都河北，“示将亲征，以伐其谋”<sup>〔2〕</sup>《通鉴辑览》。——作者原注；亦非美术或经济之动态，实少所营建。

北宋政治经济文化之力量，集中于东京建设者百数十年。汴京宫室坊市繁复增盛之状，乃最代表北宋建筑发展之趋势。

东京旧为汴州，唐建中节度使重筑，周二十里许，宋初号里城。新城为周显德所筑，周四十八里许，号曰外城。<sup>〔3〕</sup>《历代帝王宅京记》引赵德麟《侯鯖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宋太祖因其制，仅略广城东北隅，仿洛阳制度修大内宫殿而已。真宗以“都城之外，居民颇多，复置京新城外八厢”<sup>〔4〕</sup>《宋会要辑稿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神宗徽宗再缮外城，则建敌楼瓮城，又稍增广，城始周五十里余。<sup>〔5〕</sup>李濂《汴京遗迹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

太宗之世，城内已“比汉唐京邑繁庶，十倍其人”<sup>〔6〕</sup>《续通鉴长编》至道元年张洎语。——作者原注；继则“甲第星罗，比屋鳞次，坊无广巷，市不通骑”<sup>〔7〕</sup>《汴京遗迹志》载《皇畿赋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

迄北宋盛世，再接再厉，至于“栋宇密接，略无空隙，纵得价钱，何处买地？”<sup>〔1〕</sup>孟

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

其建筑之活跃，不言可喻，汴京因其水路交通，成为经济中枢，乃商业之雄邑，而建为国都者；加以政治原因，“乘輿之下，士庶走集”，其繁荣尤急促；官私建置均随环境展拓，非若隋唐两京皇帝坊市之预布计划，经纬井井者也。其特殊布置，因地理限制及逐渐改善者，后代或模仿以为定制。

汴京有穿城水道四，其上桥梁之盛，为其壮观，河街桥市，景象尤为殊异。大者蔡河，自城西南隅入，至东南隅出，有桥十一。汴河则自东水门外七里，至西水门外，共有桥十三。小者五丈河，自城东北入，有桥五，金水河从西北水门入城，夹墙遮檐入大内，灌后苑池浦，共有桥三。<sup>〔2〕</sup>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

桥最著者，为汴河上之州桥，正名大汉桥，正对大内御街，即范成大所谓“州桥南北是大街”者也。桥低平，不通舟船，唯西河平船可过，其下密排石柱，皆青石为之；又有石梁石笋楯栏。近桥两岸皆石壁，镌刻海马、水兽、飞云之状。“州桥之北，御路东西，两阙楼观对耸。”<sup>〔3〕</sup>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 金元两都之周桥，盖有意仿此，为宫前制度之一。桥以结构巧异称者，为东水门外之虹桥，“无柱，以巨木虚架，饰以丹雘，宛如飞虹”<sup>〔4〕</sup>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

大内本唐节度使治所，梁建都以为建昌宫，晋号大宁宫，周加营缮，皆未增大，“如王者之制”。太祖始“广皇城东北隅，……命有司画洛阳宫殿，按图修之……，皇居始壮丽”<sup>〔5〕</sup>《宋会要辑稿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

“宫城周五里”<sup>〔6〕</sup>《宋史·地理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南三门，正门名凡数易，至仁宗明道后，始称宣德<sup>〔7〕</sup>《玉海》卷一七〇。——作者原注，两侧称左掖右掖。宫城东西之门，称东华西华，北门曰拱宸。东华门北更有便门，“西与内直门相直”，成曲屈形。称谿门<sup>〔8〕</sup>叶少蕴《石林燕语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此门之设及其位置，与太祖所广皇城之东北隅，或大略有关。

宣德门又称宣德楼，“下列五门，皆金钉朱漆。壁皆砖石间甃，镌镂龙凤飞云之状。……莫非雕甍画栋，峻桷层榱。覆以琉璃瓦，曲尺朵楼，朱栏彩槛。下列两阙亭相对”。自宣德门南去，“坊巷御街……约阔三百余步。两边乃御廊，旧许市人买卖其间。自政和间，官司禁止，各安立黑漆杈子，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，中心道不得人马行往。行人皆在朱杈子外。杈子内有砖石甃砌御沟水

两道，尽植莲荷。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，春夏之日，望之如绣”[1]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宣德楼建筑极壮丽，宫前布置又改缮至此，无怪金元效法作“千步廊”之制矣。

大内正殿之大致，据史志概括所述，则“正南门（大庆门）内，正殿曰大庆，正衙曰文德。……大庆殿北有紫宸殿，视朝之前殿也。西有垂拱殿，常日视朝之所也。……次西有皇仪殿，又次西有集英殿，宴殿也，殿后有需云殿，东有升平楼，宫中观宴之所也。后宫有崇政殿，阅事之所也。殿后有景福殿，西有殿北向曰延和，便坐殿也。凡殿有门者皆随殿名”[2]《宋史·地理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

大庆殿本为梁之正衙，称崇元殿，在周为外朝，至宋太祖重修，改为乾元殿，后五十年间曾两被火灾，重建易名大庆。至仁宗景祐中（公元一〇三四年），始又展拓为广庭。“改为大庆殿九间，挟各五间，东西廊各六十间，有龙墀沙墀，正值朝会册尊号御此殿。……郊祀斋宿殿之后阁……”[3]《玉海》卷一六〇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又十余年，皇祐中“飡明堂，恭谢天地，即此殿行礼”，“仁宗御篆明堂二字行礼则揭之”。[4]叶少蕴《石林燕语》。——作者原注

秦汉至唐叙述大殿之略者，多举其台基之高峻为其规模之要点；独宋之史志及记述无一语及于大殿之台基，仅称大庆殿有龙墀沙墀之制。

“文德殿在大庆殿之西少次”[5]叶少蕴《石林燕语》。——作者原注，亦五代旧有，后唐曰端明，在周为中朝，宋初改文明。灾后重建，改名文德[6]《玉海》卷一六〇。——作者原注。“紫宸殿在大庆殿之后，少西其次又为垂拱……紫宸与垂拱之间有柱廊相通，每日视朝则御文德，所谓过殿也。东西阁门皆在殿后之两旁，月朔不御过殿，则御紫宸，所谓入阁也。”[7]叶少蕴《石林燕语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文德殿之位置实堪注意。盖据各种记载广德，紫宸，垂拱三殿成东西约略横列之一组，文德既为“过殿”，居其中轴，反不处于大庆殿之正中线上，而在其西北偏也[8]《玉海》卷一六〇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宋殿之区布情况，即此四大殿论之，似已非绝对均称或设立一主要南北中心线者。

初，太祖营治宫殿“既成，帝坐万岁殿（福宁殿在垂拱后，国初曰万岁）”[9]《玉海》卷一六〇。——作者原注，“洞开诸门，端直如绳，叹曰‘此如吾心，小有私曲人皆见之矣’”[10]《邵氏闻见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，对于中线引直似极感兴味。又“命怀义等凡诸门与

殿顶相望。无得辄差。故垂拱，福宁，柔仪，清居四殿正重，而左右掖与左右升龙银台等诸门皆然”<sup>[1]</sup>叶少蕴《石林燕语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福宁为帝之正寝，柔仪为其后殿，乃后寝，故垂拱之南北中心线，颇为重要。大庆殿之前为大庆门，其后为紫宸殿，再后，越东华西华横街之北，则有崇政殿，再后更有景福殿，实亦有南北中线之成立，唯各大殿东西部位零落，相距颇远，多与日后发展之便。如皇仪在垂拱之西，集英宴殿自成一组，又在皇仪之西，似皆非有密切关系者，故福宁之两侧后又建置太子宫，如庆寿宝慈，而无困难<sup>[2]</sup>《玉海》卷一五八。——作者原注，而柔仪之西，日后又有睿思殿等。<sup>[3]</sup>《玉海》卷一六〇。——作者原注

崇政初为太祖之简贤讲武，“有柱廊，次北为景福殿，临放生池”，规模甚壮。太宗真宗仁宗及神宗之世，均试进士于此，后增置东西两阁，时设讲读，诸帝日常“观阵图，或对藩夷，及宴近臣，赐花作乐于此”，盖为宫后宏壮而又实用之常御正殿，非唯“阅事之所”而已。<sup>[4]</sup>《玉海》卷一六〇。——作者原注

宋宫城以内称宫者，初有庆圣及延福，均在后苑，为真宗奉道教所置。广圣宫供奉道家神像，后示奉真宗神御，内有五殿，一阁曰降真，延福宫内有三殿，其中灵顾殿，亦为奉真宗圣容之所。真宗咸平中，“宰臣等言：汉制帝母所居称宫，如长乐积庆……等，请命有司为皇太后李建宫立名。……诏以滋福殿（即皇仪）为万安宫”。<sup>[5]</sup>《玉海》卷一五八。——作者原注。母后之宫自此始，英宗以曹太后所居为慈寿宫，至神宗时曹为太皇太后，故改名庆寿（在福宁殿东）；又为高太后建宝慈宫（在福宁西）等皆是也。母后所居既尊为宫，内立两殿，或三殿，与宋以前所谓“宫”者规模大异。此外又有太子所居，至即帝位时改名称宫，如英宗之庆宁宫，神宗之睿成宫皆是<sup>[6]</sup>《玉海》卷一五八。——作者原注。

初，宋内廷藏书之所最壮丽者为太宗所置崇文院三馆，及其中秘阁，收藏天下图籍<sup>[7]</sup>《玉海》卷一六三。——作者原注，“栋宇之制皆帝亲授”，后苑又有太清楼，尤在崇政殿西北，楼“与延春仪凤翔鸾诸阁相接，贮四库书”。真宗常“曲宴后苑临水阁垂钓，又登太清楼，观太宗圣制御书，及亲为四库群书，宴太清楼下”<sup>[8]</sup>《玉海》卷一六四。——作者原注。作诗赐射赏花钓鱼等均在此，及祥符中，真宗“以龙图阁奉太宗御制文集及典籍，图画，宝瑞之物，并置待制学士官，自是每

帝置一阁”<sup>[1]</sup>《玉海》卷一六四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天章宝文两阁（在龙图后集英殿西）<sup>[2]</sup>《玉海》卷一六三。——作者原注为真仁两帝时所自命以藏御集，神宗之显谟阁，哲宗之徽猷阁，皆后追建，唯太祖英宗无集不为阁<sup>[3]</sup>叶少蕴《石林燕语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徽宗御笔则藏敷文阁。是所谓宋“文阁”者也<sup>[4]</sup>李燾《汴京遗迹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每阁东西序皆有殿，龙图阁四序曰资政崇和宣德述古<sup>[5]</sup>《玉海》卷一五八。——作者原注，天章阁两序曰群玉蕊珠；宝文阁两序曰嘉德延康<sup>[6]</sup>《玉海》卷一六三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内庭风雅，以此为最，有宋珍视图书翰墨之风，历朝不改，至徽宗世乃臻极盛。宋代精神实多无形寓此类建筑之上。

后苑禁中诸殿，龙图等阁，及太后各宫，无在崇政殿之东者。唯太子读书之资善堂在元符观，居宫之东北隅，盖宫东部为百司供应之所，如六尚局，御厨殿等及禁卫鞅官亲从等所在<sup>[7]</sup>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东华门及宫城供应入口；其外“市井最盛，盖禁中买卖所在”<sup>[8]</sup>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

所谓外诸司，供应一切燃料，食料，器具，车驾及百物之司，虽散处宫城外，亦仍在旧城外城之东部。盖此以五丈河入城及汴蔡两河出城处两岸为依据。粮仓均沿河而设，由东水门外虹桥至陈州门里，及在五丈河上者，可五十余处<sup>[9]</sup>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东京宫城以内布置，乃不免受汴梁全城交通趋势之影响。后苑部署偏于宫之西北者，亦缘于“金水河由西北水门入大内，灌其池浦”，地理上之便利也。<sup>[10]</sup>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

考宋诸帝土木之功，国初太祖朝（公元九六〇～九七六年）建设未尝求奢，而多豪壮，或因周庙之制，宋初视为当然，故每有建置，动辄数百间。如太祖诏“于右掖门街临汴水起大第五百间”<sup>[11]</sup>《宋朝事实》卷二〇。——作者原注。以赐蜀主孟昶；又于“朱雀门外建大第甲于鞅下，名礼贤宅，以待钱俶”<sup>[12]</sup>《玉海》卷七五。——作者原注，及“开宝寺重起繚廊，朵殿凡二百八十区”<sup>[13]</sup>《玉海》卷一六四。——作者原注，皆为豪举壮观。及太宗世（公元九七六～九九七年），规模愈大。以其降生地建启圣院，“六年而功毕，殿宇凡九百余间，皆以琉璃瓦覆之”<sup>[14]</sup>《玉海》卷六八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又建上清太平宫：“宫成，总千二百四十二区”<sup>[15]</sup>《玉海》卷一〇〇。——作者原注，实启北宋崇奉道教侈置宫殿之端。其他如崇文院，三馆，秘阁之建筑，“轮奐壮丽，冠

乎内庭，近世鲜比”<sup>〔1〕</sup>《玉海》卷六八。——作者原注。“端拱中，开宝寺造塔八角十三层，高三百六十尺。”塔成，“田锡上疏曰：众谓金碧荧煌，臣以为涂膏衅血，帝亦不怒”。<sup>〔2〕</sup>李濂《汴京遗迹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画家郭忠恕，巧匠喻浩，皆当时建筑人材，超绝流辈者也<sup>〔3〕</sup>僧文莹《玉壶清话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

真宗朝（公元九九七～一〇二二）愈崇道教，趋祥异之说，盛礼缛仪，费金最多。作玉清照应宫“凡二千六百一十楹，以丁谓为修宫使，调诸州工匠为之，七年而成”。不仅工程浩大，乃尤重巧丽制作。所用木石彩色颜料均四方精选<sup>〔4〕</sup>《宋朝事实》卷七。——作者原注。殿宇外有山池亭阁之设，环殿及廊庑皆遍绘壁画。艺术之精，冠于北宋历朝宫观。殿上梁曰“上皆亲临护，……工人以文缵裹梁，金饰木，寓龙负之辂以升。……修宫使以下及营缮掌事者，咸赐以衣带金帛”<sup>〔5〕</sup>《宋朝事实》卷七。——作者原注。此宫兴作之严重，实为特殊，此后真宗其他建置莫能及，但南熏门外奉五岳之会灵观，及大内南，奉圣祖之景灵宫（宫之南壁绘赵氏事迹二十八事）则皆制度华美，均以丁谓董其事。京师以外，宫观亦多宏大，且诏天下州府，皆建道观一所，即以天庆为名。<sup>〔6〕</sup>李濂《汴京遗迹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

仁宗之世（公元一〇二三～一〇六三年），夏始自大，屡年构兵，国用枯竭，土木之事仍不稍衰，但多务重修。明道元年（公元一〇三二年），修文德殿成，宫中又大火，延烧八殿，皆大内主要，如紫宸，垂拱，福宁，集英，延和等殿。“乃命宰相吕夷简为修葺大内使，发四路工匠给役，又出内库乘舆物及缗钱二十万助其费。”<sup>〔7〕</sup>《宋史·地理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先此两年（天圣八年），玉清照应宫因雷雨灾，时帝幼，太后垂帘泣告辅臣，众恐有再葺意，力言“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，遽为灰烬，非出人意；如因其所存，又复修葺，则民不堪命。……”<sup>〔8〕</sup>李濂《汴京遗迹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于是宫不复修，仅葺两殿。二十五年后（至和中），始又增缮两殿，改名万寿观，仁宗末季，多修葺增建，现存之开封琉璃塔，即其中之一。名臣迭上疏乞罢修寺观<sup>〔9〕</sup>《玉海》卷一六四。——作者原注。欧阳修上疏《上仁宗论京师土木劳费》中云：“开先殿初因两条柱损，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万七千五百有零。又有睦亲宅，神御殿，……醴泉观……等处物料不可悉数，……军营库务合行修造者百余处。……使厚地不生它物，唯产木材，亦不能供此广费。”又云：“累年火灾，

自玉清照应，洞真、上清、鸿庆、祥源、会灵七宫，开宝、兴国两寺塔殿，并皆焚烧荡尽，足见天厌土木之华侈，为陛下惜国力民财……”<sup>〔1〕</sup>李肇《汴京遗迹志》。

作者原注 终仁宗朝，四十年间，焚毁旧建，与重修劳费，适成国家双重之痛也。

英宗在位仅四年（公元一〇六四～一〇六七年），土木之事已于司马光《乞停寝京城不急修造》之疏中见其端倪<sup>〔2〕</sup>《玉海》卷一六四。——作者原注。盖是时宫室之修造，非为帝王一己之意，臣下有司固不时以土木之宏丽取悦上心。人君之侧，实多如温公所言，“外以希旨求知，内以营私规利”之人也。

神宗（公元一〇六七～一〇八五年）行新政，富改革精神以强国富民为目的，故“宫室弗营，池籞苟完，而府寺是崇”<sup>〔3〕</sup>李肇《汴京遗迹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所作盖多衙署之建置：如东西两府<sup>〔4〕</sup>《汴京遗迹志》载曾肇重修御史台记。——作者原注，御史台<sup>〔5〕</sup>《汴京遗迹志》载陈绎新修东府西府记。——作者原注、太学等<sup>〔6〕</sup>《汴京遗迹志》载曾肇重修御史台记。——作者原注皆是也。

元丰中，缮葺城垣，浚治壕塹，亦皆市政之事<sup>〔7〕</sup>《宋朝燕翼诒谋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又因各帝御容散寓宫中，及宫外诸寺观，未合礼制，故创各帝原庙之制。建六殿于景宁宫内，以奉祖宗像，又别为三殿以奉母后<sup>〔8〕</sup>《历代帝王宅京记》引宋敏求《东京记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

熙宁中，从司天监之奏，请建中太一宫，但仅就五岳观旧址为之<sup>〔9〕</sup>李心传《朝野杂记》。《汴京遗迹志》引。——作者原注。遵故事“太一”行五宫，四十五年一易，“行度所至，国民受其福”<sup>〔10〕</sup>《宋会要辑稿》。——作者原注，实不得不从民意。太宗建东太一宫四十五年，至仁宗天圣建西太一宫，至是又四十五年也<sup>〔11〕</sup>《汴京遗迹志》引龚明之《中吴纪闻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

哲宗（公元一〇八六～一一〇〇年）制作多承神宗之训，完成御史台其一也。又于禁中神宗睿思殿后建宣和殿。末年则建景宁西宫于驰道西<sup>〔12〕</sup>《玉海》卷一〇〇。——作者原注，亦如神宗所创原庙制度，及崩，徽宗即位续成之。宫期年完工，以神宗原庙为首，哲宗次之<sup>〔13〕</sup>李心传《朝野杂记》、《汴京遗迹志》引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哲宗即位之初，宣仁太后垂帘，时上清太平宫已久毁于火，后重建，称上清储祥宫，以内庭物及金六千两成之<sup>〔14〕</sup>《汴京遗迹志》引苏轼《上清储祥宫碑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苏轼承旨撰碑。碑云“雄丽靓深，凡七百余间”，宫之规模虽不如太宗时，当尚可观。

迨徽宗立（公元一一〇一～一一二五年），以天纵艺资，入绍大统，其好奢丽之习，出自天性。且奸邪盈朝，掊剥横赋，倡丰亨豫大之说<sup>〔15〕</sup>《通鉴辑览》。——

作者原注，故尤侈为营建。崇宁大观以还，大内朝寝均丽若琼瑶，官苑殿阁又增于昔矣。其著者如“政和三年辟延福新宫于大内之北拱宸门外；悉移其地供应诸库，及两僧寺，两军营，而作焉”<sup>〔1〕</sup>《宋史·地理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宫共五位，分任五人，各为制度，不务沿袭。其殿阁亭台园苑之制，已为艮岳前驱，“叠石为山，凿池为海，作石梁以升山亭，筑土冈以植杏林，又为茅亭鹤庄之属”<sup>〔2〕</sup>《宋史·地理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，以仿天然。此后作撷芳园，“称延福第六位，跨城之外，西自天波门东过景龙门，至封邱门”，实沿金水河横贯旧城北面之全部。“名景龙江，绝岸至龙德宫，皆奇花珍木，殿宇比比对峙”<sup>〔3〕</sup>《宋史·地理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又作上清宝篆宫，“密连禁署，内列亭台馆舍，不可胜计。……开景龙门，城上作复道通宫内，……徽宗数从复道往来”<sup>〔4〕</sup>《宋史·地理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其他如作神霄玉清万寿宫于禁中，又铸九鼎，置九成宫于五岳观后。政和以后，年年营建，皆工程浩大，缀饰繁缛之作。及造艮岳万寿山，驱役万夫，大兴土木；五六年间，穷索珍奇，纲运花石；尽天下之巧工绝技，以营假山，池沼<sup>〔5〕</sup>《汴京遗迹志》僧祖秀《华阳宫记》。——作者原注，至于山周十余里，峰高九十步；怪石巖崖，洞峡溪涧，巧夺造化；而亭台馆阁，日增月益，不可殚记<sup>〔6〕</sup>《汴京遗迹志》徽宗御制《艮岳记略》。——作者原注；其部署结构颇越乎常轨，非建筑壮健之姿态，实失艺术真旨。时金已亡辽，宋人纳岁币于金，引狼入室，宫廷犹营建不已，后世目艮岳为亡国之孽，固非无因也。

宋初宫苑已非秦汉游猎时代林囿之规模，即与盛唐离宫园馆相较亦大不相同。北宋百余年间，御苑作风渐趋绮丽纤巧。尤以徽宗宣政以后所辟诸苑为甚。玉津园，太祖之世习射观稼而已，乾德初，置琼林苑，太宗凿金明池于苑北<sup>〔7〕</sup>《玉海》卷一七二。——作者原注，于是各朝每岁驾幸观楼船水嬉，赐群臣宴射于此。后苑池名象瀛山，殿阁临水，云屋连簷，诸帝常观御书，流杯泛觴游宴于玉宸等殿<sup>〔8〕</sup>《玉海》卷一七一。——作者原注。“太宗雍熙三年，后常以暮春召近臣赏花钓鱼于苑中”<sup>〔9〕</sup>《宋朝事实》卷二〇。——作者原注。“命群臣赋诗赏花曲宴自此始。”<sup>〔10〕</sup>《通鉴辑览》。——作者原注

金明池布置情状，政和以后所纪，当经徽宗增置展拓而成。“池在顺天门街北，周围约九里三十步，池东西径七里许。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余步，有西北临水殿。……又西去数百步乃仙桥，南北约数百步；桥面三虹，朱漆栏楯，

下排雁柱，中央隆起，谓之骆驼虹，若飞虹之状。桥尽处五殿正在池之中心，四岸石甃向背大殿，中坐各设御幄。……殿上下回廊。……桥之南立棂星门，门里对立彩楼。……门相对街南有砖石甃砌高台，上有楼，观骑射百戏于此……”[1]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 規制之绮丽窈窕与宋画中楼阁廊庑最为迫肖。

徽宗之延福撝芳及艮岳万寿山布置又大异，朱勔，蔡攸辈穷搜太湖灵壁等地花石以实之，“宣和五年，朱勔于太湖取石，高广数丈，载以大舟，挽以千夫，凿河断桥，毁堰圻闸，数月乃至”[2]李濂《汴京遗迹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盖所着重者及峰峦崖壑之缔构；珍禽奇石，环花异木之积累；以人工造天然山水之奇巧，然后以楼阁点缀其间。[3]《汴京遗迹志》僧祖秀《华严宫记》。——作者原注[4]《汴京遗迹志》徽宗御制《艮岳记略》。——作者原注 作风又不同于琼林苑金明池等矣。叠山之风，至南宋乃盛行于江南私园，迄元明清不稍衰。

真仁以后，殖货致富者愈众，巨量交易出入京师，官方管理之设备及民间商业之建筑，皆因之侈大。公卿商贾拥有资产者之园圃第宅，皆争尚靡丽，京师每岁所需木材之夥，使宫民由各路市木不已，且有以此居积取利者[5]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》。——作者原注，营造之盛实普遍民间。

市街店楼之各种建筑，因汴京之富，乃登峰造极。商业区如“潘楼街……南通一巷，谓之界身，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；屋宇雄壮，门面广阔，望之森然”[6]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娱乐场如所谓“瓦子”，“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，……中瓦莲花棚牡丹棚；里瓦夜叉棚，象棚；最大者可容数千人”[7]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酒店则“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。……入门一直主廊，约百余步，南北天井，两廊皆小阁子，向晚灯烛荧煌，上下相映。……白矾楼后改丰乐楼，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，五楼相向，各有飞桥栏槛，明暗相通”[8]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其它店面如“马行街南北十几里，夹道药肆，盖多国医，咸巨富。……上元夜烧灯，尤壮观”[9]蔡绦《铁围山丛谈》卷四。——作者原注。

住宅则仁宗景祐中已是“士民之族，罔遵矩度，争尚纷华。……室屋宏丽，交穷土木之工”[10]《宋朝事实》卷一三。——作者原注。“宗戚贵臣之家，第宅园圃，服饰器用，往往穷天下之珍怪……以豪华相尚，以俭陋相訾”[11]《温国文正公集·论财利疏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

市政上特种设备，如“望火楼……于高处砖砌，……楼上有人卓望，下有官屋数间，屯驻军兵百余人，及储藏救火用具。每坊巷三百步设有军巡铺屋一所，容铺兵五人”。新城战棚皆“旦暮修整”。“城里牙道各植榆柳，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，贮守御之器，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，每日修造泥饰。”<sup>〔1〕</sup>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

工艺所在，则有绫锦院，筑院，裁造院，官窑等等之产生。工商影响所及，虽远至蜀中锦官城，如神宗元丰六年，亦“作锦院于府治之东。……创楼于前，以为积藏待发之所。……织室吏舍出纳之府，为屋百一十七间，而后足居”<sup>〔2〕</sup>费著《蜀锦谱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

有宋一代，宫廷多崇奉道教，故宫观景盛，对佛寺惟稟续唐风，仍其既成势力，不时修建。汴京梵刹多唐之旧，及宋增修改名者。太祖开宝三年，改唐封禅寺为开宝寺，“重起缭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区。太宗端拱中建塔，极其伟丽”<sup>〔3〕</sup>李濂《汴京遗迹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塔八角十三层，乃木工喻浩所作，后真宗赐名灵感，至仁宗庆历四年塔毁<sup>〔4〕</sup>李濂《汴京遗迹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乃于其东上方院建铁色琉璃砖塔，亦为八角十三层，俗称铁塔，至今犹存，为开封古迹之一。<sup>〔5〕</sup>杨廷宝《汴郑古建筑游览纪录》，见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》第六卷第三期。——作者原注又加开宝二年诏重建唐龙兴寺，太宗赐额太平兴国寺<sup>〔6〕</sup>《宋会要稿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天清寺则周世宗创建于陈州门里繁台之上，塔曰兴慈塔，俗名繁塔，太宗重建。明初重建，削塔之顶，仅留三级<sup>〔7〕</sup>杨廷宝《汴郑古建筑游览纪录》，见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》第六卷第三期。——作者原注，今日俗称婆塔者是。宝相寺亦五代创建，内有弥勒大像，五百罗汉塑像，元末始为兵毁<sup>〔8〕</sup>李濂《汴京遗迹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

规模最宏者为相国寺，寺建于北齐天保中，唐睿宗景云二年（公元七一一年）改为相国寺；玄宗天宝四年（公元七四五年）建资圣阁；宋至道二年（公元九九六年）敕建三门，制楼其上，赐额大相国寺。曹翰曾夺庐山东林寺五百罗汉北归，诏置寺中<sup>〔9〕</sup>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当时寺“乃瓦市也，僧房散处，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余人，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。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，必由于此”<sup>〔10〕</sup>《宋朝燕翼诒谋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实为东京最大之商场<sup>〔11〕</sup>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寺内“有两琉璃塔，……东西塔院。大殿两廊皆国相名公笔迹，

左壁画炽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戏。右壁佛降鬼子母，建立殿庭，供献乐部马队之类。大殿朵廊皆壁隐楼殿人物，莫非精妙”[1]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

京外名刹当首推正定府龙兴寺。寺隋开皇创建，初为龙藏寺，宋开宝四年，于原有讲殿之后建大悲阁，内铸铜观音像，高与阁等。宋太祖曾幸之，像至今屹立，阁已残破不堪修葺，其周围廊庑塑壁，虽仅余鳞爪，尚有可观者。寺中宋构如摩尼殿，慈氏阁，转轮藏等，亦幸存至今。[2]梁思成《正定调查纪略》，发于《中国营造

学社汇刊》第四卷第二期。——作者原注

北宋道观，始于太祖，改周之太清观为建隆观，亦诏以扬州行宫为建隆观。太宗建上清太平宫，规模始大。真宗尤溺于符谶之说，营建最多，尤侈丽无比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即建隆观增建为玉清照应宫，凡役工日三四万。[3]《宋朝事实》卷七。——

作者原注“初议营宫料工须十五年，修宫使丁谓令以夜续昼，每画一壁给二烛，故七年而成。……制度宏丽，屋宇稍不中程式，虽金碧已具，刘承珪必令毁而更造”。[4]《宋史纪事本末》。——作者原注又诏天下遍置天庆观，迄于徽宗，惑于道士林灵素等，作上清宝篆宫。亦诏“天下洞天福地，修建宫观，塑造圣像”[5]《通鉴辑览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宣和元年，竟诏天下更寺院为宫观，次年始复寺院额。[6]《通鉴辑览》。——作者原注

洛阳宋为西京，山陵在焉。“开宝初，遣王仁珪等修洛阳宫室，太祖至洛，睹其壮丽，王等并进秩。……太祖生于洛阳，乐其土风，常有迁都之意”[7]《玉海》卷一五八。——作者原注，臣下谏而未果。宫城周九里有奇，城南三门，中曰五凤楼，伟丽之建筑也。东西北各有一门。曰苍龙，曰金虎，曰拱宸。正殿曰太极殿，前有左右龙尾道及日楼月楼[8]《玉海》卷一五八。——作者原注。“宫室合九千九百九十余区”[9]《宋史·地理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，规模可称宏壮。皇城周十八里有奇，各门与宫城东西诸门相直，内则诸司处之。[10]《宋史·地理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京城周五十二里余，尤大于汴京。神宗曾诏修西京大内。[11]《玉海》卷一五八。——作者原注徽宗政和元年及六年之间之重修，预为謁陵西幸之备，规模尤大。“以真漆为饰，工役甚大，为费不资。”[12]《宋史·地理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至于洛阳园林之盛，几与汴京相伯仲。重臣致仕，往往径第西洛。自富郑公至吕文穆等十九园[13]李格非《洛阳名园记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其馆榭池台配造之巧，亦可见当时洛阳经营之劳，与财力之盛也。

徽宗崇宁二年（公元一一〇三年），李诫作营造法式，其中所定建筑規制，较与宋辽早期手法，已迥然不同。盖宋初禀承唐末五代作风，结构犹硕健质朴。太宗太平兴国（公元九七六年）以后，至徽宗即位之初（公元一一〇一年），百余年间，营建旺盛，木造規制已迅速变更；崇宁所定，多去前之硕大，易以纤靡，其趋势乃刻意修饰而不重魁伟矣。徽宗末季，政和迄宣和间，锐意制作，所本风格，尤尚绮丽，正为实施营造法式之时期，现存山西榆次大中祥符元年（公元一〇〇八年）之永寿寺雨华宫，与太原天圣间（公元一〇二三～一〇三一年）之晋祠等，结构秀整犹带雄劲，骨干虽已无唐制之硕建庞大，细部犹未有崇宁法式之繁琐纤弱，可称其为北宋中坚之典型风格也。

### 第三节 辽之都市及宫殿

契丹之初为东北部落，游牧射生，以给日用，故“草居野处靡有定所”<sup>〔1〕</sup>《辽史·营卫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并东西奚，统一本族八部，国势始张。其汉化创业之始，用幽州人韩延徽等，“营都邑，建宫殿，法度井井”<sup>〔2〕</sup>《辽史·韩延徽传》。——作者原注，中原所为者悉备。迨援立石晋，太宗耶律德光得晋所献燕云十六州，改元会同（公元九三八年），建号称辽，诏以皇都临潢府（今热河林西县）为上京，升幽州为南京，定辽阳为东京。辽势力从此侵入云朔幽蓟（今山西、河北北部）。危患北宋，百数十年。圣宗统和二十五年（公元一〇〇七年）即宋真宗大中祥符之初，以大定府为中京（今热河朝阳平泉，赤峰等县地），又三十余年至兴宗重熙十三年（公元一〇四四年），更以大同府为西京，于是五京备焉。

辽东为汉旧郡，渤海人居之，奚与渤海皆深受唐风之熏染。契丹部落之崛起与五代为同时，耶律氏实宗唐末边疆之文化，同化于汉族，进而承袭中原北首州县文物制度之雄者也。契丹本富于盐铁之利，其初有“回国使”<sup>〔3〕</sup>《通鉴·后晋记》。——作者原注往来贩易，鬻其牛羊，毳，罽，驰马，皮革，金珠，药材等以市他国货物，其后辽更与北宋，西夏，高丽，女真诸国沿边所在，共置榷场市易，

商业甚形发达，都市因此繁盛<sup>〔1〕</sup>王家琦《辽赋税考》，见《东北集刊》第一期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其都市街隅，“有楼对峙，下连市肆”。其中“邑屋市肆有绫锦之作，宦者，伎术，教坊，角抵，儒僧尼道皆中国人，并汾幽蓟为多”<sup>〔2〕</sup>《历代帝王宅京记》引胡峤记。——作者原注。辽世重佛教，营僧寺，刊经藏，不遗余力，尝“择良工于燕蓟”。凡宫殿佛寺主要建筑，实均与北宋相同。盖两者均上承唐制，继五代之余，下启金元之中国传统木构也。

太祖于神册三年（公元九一八年）治城临潢，名曰皇都；二十一年后，至太宗，改称上京<sup>〔3〕</sup>《历代帝王宅京记》引胡峤记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太祖建元神册之前，所居之地曾称西楼。“阿保机以其所为上京，起楼其间，号西楼，又于其东……起东楼，北……起北楼，南木叶山起南楼，往来射猎四楼之间。”<sup>〔4〕</sup>《五代史·四夷附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盖阿保机自立之始，创建明王楼。初未筑成，其都亦未有名称。如“以所获僧……五十人归西楼，建天雄寺以居之”。“其党神速姑复劫西楼，焚明王楼”，“壬戌上发自西楼”<sup>〔5〕</sup>《辽史·太祖本纪》。——作者原注等。“契丹好鬼贵日，朔旦东向而拜日，其大会聚视国事，皆以东向为尊，四楼门屋皆东向。”<sup>〔6〕</sup>《五代史·四夷附录》。——作者原注岂西楼时期，契丹营建乃保有汉，魏，盛唐建楼之古风；而又保留其部族东向为尊之特征欤？

辽建“殿”之事，始于太祖八年冬，建开皇殿于明王楼基，早于城皇都约四年，其方向如何，今无考。“天显元年，平渤海归，乃展郭郭，建宫室，名之以天赞。起三大殿曰：开皇，安德，五銮。中有历代帝王御容，”<sup>〔7〕</sup>《历代帝王宅京记》引胡峤记。——作者原注制度似略改。迨晋遣使上尊号，太宗“诏番部，并依汉制御开皇殿，辟承天门受礼，改皇都为上京”<sup>〔8〕</sup>《辽史·地理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以后开皇五銮及宣政殿皆数见于太宗纪。

上京“城高二丈，……幅员二十七里。……其北谓之皇城，……中有大内。……大内南门曰承天；有楼阁，……东华西华。……通内出入之所”<sup>〔9〕</sup>《辽史·地理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。城正南街两侧为各司衙寺观国子监，孔子庙及二仓。天雄寺与八作司相对，均在大内南。“南城谓之汉城；南当横街，各有楼对峙，下列井肆。”<sup>〔10〕</sup>《辽史·地理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市容整备，其形制已无所异于汉族。然至圣宗开泰五年，距此时已八十年，宋人记云“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，与毡

庐皆东向”[1]《历代帝王宅京记》引胡峤记。——作者原注。然则辽上京制度，殆始终留有其部族特殊尊东向之风俗。

辽阳之大部建设为辽以前渤海大氏所遗，而大氏又本唐之旧郡，“拟建宫阙”。辽初以为东丹王国，葺其城，后升为南京，又改东京。“幅员三十里，共八门，……宫城在城东北隅……南为三门，壮以楼观。四隅有角楼，相去各二里。宫壤北有让国皇帝御容殿，大内建二殿。……外城谓之汉城，分南北市，中为看楼，……街西有金德寺，大悲寺。驸马寺铁幡竿在焉”。[2]《辽史·地理志》。——作者原注

辽南京古冀州地，唐属幽州范阳郡；唐末刘仁恭尝据以僭帝号。石晋时地入于辽。太宗立为南京，又曰燕京，是为北京奠都之始。城有八门，其四至广阔，虽屡经史家考证，仍久惑后人。地理志称“方三十六里”，其他或称二十五里及二十七里者。或言三十六里“乃并大内计度”者，其说不一。但燕城令人注意者，乃其基址与今日北京城阙之关系。其址盖在今北京宣武门迤西，越右安广宁门郊外之地。[3]奉宽《燕京故城考》，见《燕京学报》第五期。——作者原注金之中都承其旧城而展拓之，非元明清建都之北京城也。今其址之北面有旧土城及会城门村等可考。其东南隅有古之悯忠寺（今之法源寺）可考[4]奉宽《燕京故城考》，见《燕京学报》第五期。——作者原注，而今郊外之“鹅房营，有土城角，作曲尺式，幸存未铲；有豁口俗呼凤凰嘴，当因辽城丹凤门得名”[5]奉宽《燕京故城考》，见《燕京学报》第五期。——作者原注，乃燕城之西南隅也。今日北京南城著名之海王村琉璃厂等皆在燕城东壁之外。

辽太宗升幽州为南京，初无迁都之举，故不经意于营建，即以幽州子城为大内，位于大城之西南隅；宫殿门楼一仍其旧，幽州经安史之徒，暨刘仁恭父子割据僭号，已有所设施，如拱宸门元和殿等，太宗入时均已有之。[6]关承琳《西郊乡土纪》。——作者原注太宗但于西城巔诏建一“凉殿”，特书于本纪，岂仍循其“西楼”遗意者耶？

南京初虽仍幽州之旧，未事张皇改建，但至“景宗保宁五年，春正月，御五凤楼观灯”，及“圣宗开泰驻蹕，宴于内果园”[7]《日下旧闻考》。——作者原注之时，当已有若干增置，“六街灯火如昼，士庶嬉游，上亦微行观之”[8]《日下旧闻考》。——作者原注，其时市坊繁盛之概，约略可见。及兴宗重熙五年（公元一〇三六年）始诏修南